

主编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第五卷

(1929 — 1939)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编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第五卷

（1929—193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际关系史

第五卷

(1929—1939)

本卷主编

蒋相泽(常务) 王斯德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立

封面设计：雪 声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4.25 插页：4 字数：321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5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关系史》编委会

主 编：王绳祖

副主编：光仁洪 蒋相泽 卫 林 周纪荣
石 磊 鲁 毅

编 委：卫 林 王贵正 王绳祖 王斯德
王德仁 王鹏飞 石 磊 卢明华
光仁洪 朱重贵 朱瀛泉 刘同舜
刘星汉 刘 陵 孙叔林 孙福生
李石生 李肇新 吴东之 吴世民
吴机鹏 何春超 张之芮 张文淳
张兴伯 张 志 张季良 陈文艺
周纪荣 洪育沂 俞 源 唐承运
曹中屏 黄鸿钊 谢益显 蒋相泽
鲁 毅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本卷作者：第一章 周希奋

第二章	张捷	
第三章	郑寅达	
第四章	周希奋	
第五章	张脉强	
第六章	张脉强	孙国璋
第七章	周希奋	
第八章	张脉强	
第九章	姚昆遗	
第十章	姚昆遗	
附录	王吉良	袁恒军

总序

国际关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
的一门重要学科，不少国家都将其
列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对之
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更为重视这
门学科，已取得了不少有学术价值
的科研成果。

多卷本国际关系史，战后在国际
上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学者勒努万主
编的8卷《国际关系史》，前苏联学
者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
的5卷《外交史》。两书的内容均
偏重欧洲，亚非拉篇幅较少，且
各自强调本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英美学者通贯古今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著作并不多见,断代性的著述居多。如美国学者D·希尔编著的3卷《外交在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历史》;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主持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用编年体记述现代国际关系史(至60年代),共出版近50卷。这些著作均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观点。

国际关系史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有的高等院校已开始研究和建设这门学科,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尤其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以来,对学科建设更为重视,学科队伍得以集中,科研项目有所落实。因此,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勤奋耕耘、协同攻关,先后撰写出版了本学科的专著、教材、史纲、辞书、大事记等数十种;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其中有的填补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编辑或编译出版了国际关系史文件集、论丛、译丛、专刊、资料选集、历史长编等数十卷;专业基础教材《国际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或史纲)等已编著出版多种。同时,还编著出版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综合性专业理论教材。

正是在取得阶段性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友好交往的迅速开展,广大的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集体努力,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这部著作既应注重其学术性,又应重视其实际应用价值,尽可

能做到全面、系统、翔实,以供外交、政治、理论、新闻等领域的工作者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参考和检索。经过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多年筹划和准备,组成了编委会,组织了撰写队伍,拟定了大纲细目,统一了编写体例,集体编著了这部10卷本的《国际关系史》。

二

国际关系史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复杂。但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社会一切多层次、多方面的繁杂关系通常集中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是以国家与国家(包括国际组织)间的政治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注意国际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以及文化、宗教关系,并使之与国际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而且也不应忽视重要历史人物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时期,除各个民族国家外,又出现了许多非民族国家形式的行为主体。如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各地区性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宗教等国际组织与集团。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各自成为单独活动的行为主体。尽管如此,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相比,在国际社会中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它们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都受自己国家的制约、支配和控制。这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更增加了复杂性。

那么,应当用什么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揭示

其规律呢？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各种理论与思潮，以及各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基础发生影响，但“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同时，在同一书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历史的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历史的“合力论”，对揭示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结果是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有大量的论著，都是以唯物史观来剖析和阐述历史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故此，我们编著这部10卷本《国际关系史》，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其次，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

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三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国家,随之就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开始是邻国之间,进而扩大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关系,由此就有了国际关系及其发展进程。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

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加强,世界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渐改进,促使各国和各洲之间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社会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任何地区的重要事态都会影响或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

正是基于国际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这部著作着重从17世纪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其下限暂定为本世纪的70年代末。全书共10卷,按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转折性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648—1918年),即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1—3卷。

第二个时期(1917—1945年),即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4—6卷。

第三个时期(1945—1979年),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本世纪70年代末。为第7—10卷。

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今后将继续编写和出版。

参加撰写本书的作者都是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高职称教师与研究人员,又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会员。

本书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得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指导和在出版方面的优先安排,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关系史》常务编委会

1995年12月

本卷前言

本卷的内容所跨的时间是1929年至1939年。

这是风雷激荡、危机迭起的10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战云密布，世界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这1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的时期，是法西斯国家发动武装侵略的时期，也是从和平走向又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是反映其建立时（1919—1922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个体系迟早是要被打破的。德国的潜力本来就比英法大。

面对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涌起革命高潮的新局面，协约国且自签订停战协定之日（1918年11月11日）起，即蓄意保存德国的一部分实力，以镇压德国国内和中欧的革命。战后，英美还采取“扶德抑法”的政策。这就加速了德国的再度崛起。

1929年10月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结束了20年代后半期虚假的繁荣和虚幻的和平，破坏了国际经济。1932年至1933年的世界裁军会议和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均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一些国家国内则发生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代表极右势力的法西斯政党在许多国家出现。执政的法西斯分子对内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以求摆脱危机。日本虽然没有组成像德意那样的法西斯政党，但军部和民间的右翼分子通过暴力推动国家改造，建立了天皇制下以军部为中心的军阀专政，完成了法西斯化的过程。对外则提出解决“满蒙问题”，从侵华战争中寻找出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不到两年（1931年9月），即撕毁《国际联盟盟约》和《九国公约》，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用武力强行改变华盛顿体系。德国以希特勒为党魁的民族社会党（纳粹党）一上台（1933年1月），就着手毁约扩军，准备侵略战争。仍旧维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如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它们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家，则力图维持现状，同法西斯国家重划世界版图的要求尖锐对立。可是又幻想以退让避免冲突，以妥协换取和平，而且还视法西斯国家为对付苏联、防止革命的堡垒，对之采取绥靖政策，一味姑息纵容，助长侵略扩张。

日本是在经济危机驱使下侵略中国东北的。它也是抓住了经济危机的时机，估计西方大国都疲于应付其国内事务，无暇东顾，

不会出来干涉；而且也看透西方国家的恐共反苏心理，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帜以投其所好，减少阻力。果然不出所料，尽管日本的侵略行动有损于英美在华利益，同时也是对标榜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初次重大的考验，可是美、英、法都不愿因此而得罪日本。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在侵略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貌似公正，故意混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要求中日双方撤兵，实则偏袒日本。国联在1932年派出的调查团则提出一个实质上是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日本意在独占，不予接受。美国初时抱定不加干预的态度，基本立场类同国联，继而以“不承认”日军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的合法性，来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但又声明只要不损及美国在华利益，就无意争夺日本在满洲的利权。西方大国以及国联这种“牺牲满洲，求取和平”的妥协政策，无疑给予法西斯侵略者极大的鼓励。日本在这种政策的纵容下得寸进尺，继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即向华北大肆渗透。1935—1936年在华北大搞“自治运动”，妄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终于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东方侵略的火苗越煽越旺，到头来烧到纵容侵略者本身，“九一八”事变也就成为日后珍珠港事件的前奏。

在欧洲，英法当权者对纳粹德国的重新崛起也同样实行其绥靖政策。具体说，就是争取德国与英、法、意三大国谅解，以形成四国合作、主宰欧洲的局面；代价是允许修改《凡尔赛和约》，即允许德国在商定的范围内扩军，在中欧、东欧扩张领土，收回一些被战胜国夺去的海外殖民地。英国的决策者常把这种交易叫做“全面解决办法”。可是，希特勒要的不是几国合作，而是一国独霸；不是修改和约，而是征服欧洲，进而征服世界，在被征服

地区灭绝“劣等种族”；不是有限扩军，而是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备；不是“全面解决”，而是在必要时与邻国签订双边协定，以便分化敌手，以后又可随时撕毁协定。绥靖政策注定要失败，缘故在此。它只是起了削弱自身，助长侵略，加速战争到来的作用。

希特勒在上台后的头两年还比较谨慎，甚至迎合西方，诡称德国只求在军备上获得平等地位，以便能够充当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向西蔓延的卫士。

到1935年3月，他觉得他在国内的统治已臻巩固，并断定英法不会用武力阻止德国大规模扩军，便悍然恢复征兵制，推翻《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随后英国竟与德国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以实际行动赞同德国扩军，结果只换来一张废纸。

自1935年春德国开始单方面废约之时起，世界政局便进入法西斯国家任意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事变日亟的时期。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征服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英法操纵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而又故意使制裁无效，致使意大利倒向德国，又使德国更加肯定英法不会制止侵略。希特勒遂将原定1937年春重新武装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计划提前一年于1936年3月执行。英法又试图用默许这次行动来换取德国接受一个新的保障西欧各国安全的方案，但德国根本不予理睬。同年7月，意大利和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出兵援助叛军。英法则实行“不干涉政策”，实则不干涉德意对西班牙的干涉，只用不干涉政策来阻止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从国外取得援助。在这期间，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极力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避免卷入欧洲冲突。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美国即实行其《中立法》，对交战国双方禁运武器，并在国联宣布对意“经济制裁”期间，以非会

员国的身份继续和意大利大做生意，填补了“制裁”所留下的空缺，使意大利得以在急需的时候，源源不断地获得石油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美国又修改其《中立法》，使之适用于内战国家，和英法等国一起堵塞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从国外获得武器的渠道。这种只对侵略者有利的政策，实质上是绥靖政策。日本在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遂集中在远东和地中海区域。这就给希特勒提供了在中欧采取侵略行动的良机。他在1937年11月5日对他的僚属说，他将在时机到来时进攻英法，在此以前，他将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保障侧翼。

在这以后，大战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了。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希特勒旋即即将侵略矛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30日下令要在10月1日前完成便捷的准备。英国政府却把这次危机视为与德国做交易的最后机会。首相张伯伦亲自出马，与希特勒勾结，在慕尼黑签订了英法德意四国协定（1938年9月30日），把捷领土苏台德地区送给德国。这是推行满足德国要求以争取四国合作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从希特勒那里换得一纸联合声明的空文，谓德英将以协商办法解决和两国有关的一切问题，以此保证欧洲的和平。事实是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慕尼黑协定签订后12天，他就下令拟制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计划。德国灭捷（1939年3月）之后，立即转向波兰。西方公众大为震动。英法政府只得对波兰的安全做出保证。英国的保证并非军事威慑，而是一种外交姿态，意在摆出要建立两条战线的架势，以迫使希特勒再做一次交易。英法不可能直接援助波兰，没有苏联的支持，东面的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而英法却恰恰没有与苏